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

FANYU SHIXUE YU XIFANG SHIXUE
BIJIAO YANJIU



नाट्यशास्त्रम्

尹锡南 著

梵语诗学与
西方诗学比较研究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 / 尹锡南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10

ISBN 978-7-80752-663-6

I. ①梵… II. ①尹… III. ①诗歌—对比研究—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I351.072②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5486 号

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

Fan Yu Shi Xue Yu Xi Fang Shi Xue Bi Jiao Yan Jiu

尹锡南 著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五州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8) 85011398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8.625

字 数 4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663-6

定 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编委会

主 编：曹顺庆

编 委：冯宪光 王晓路 李 怡

徐新建 刘亚丁 阎 嘉

吴兴明 段志洪

秘 书：王彤伟

目 录

绪 论	(1)
-----------	-----

上 编 宏观性比较研究

第一章 东西异同：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文化土壤	(19)
第一节 语言修辞与诗学话语建构	(20)
第二节 宗教哲学与诗学话语建构	(28)
第三节 文学传统与诗学话语建构	(47)
第二章 源远流长：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历史发展	(62)
第一节 梵语诗学的发展轨迹	(63)
第二节 西方诗学的历史演变	(85)
第三节 印度与西方诗学的发展规律	(98)

中 编 专题性比较研究

第一章 双峰并峙：《诗学》与《舞论》的戏剧理论比较	(120)
------------------------------------	-------

第一节	“即兴表演”和“戏剧吠陀”：两种戏剧起源说	(121)
第二节	“净化”与“味”：两个戏剧关键词	(126)
第三节	Mimesis 与 Anukirtana：两种戏剧模仿论	(131)
第四节	两种戏剧观：类型、情节、角色和语言	(136)
第五节	两种戏剧理论的影响和发展	(146)
第六节	悲剧论在跨文化语境里的批评运用	(157)
第二章	语言魔方：庄严论、风格论与西方诗学	(166)
第一节	庄严论与西方诗学	(166)
一、	庄严与修辞、庄严论与修辞论	(167)
二、	两种诗学中的庄严或修辞考察	(175)
三、	梵语诗学诗病说与西方诗学隐喻论	(185)
第二节	风格论与西方诗学	(194)
一、	印度风格论发展简述	(195)
二、	西方风格论发展简述	(202)
三、	印度与西方风格论比较	(208)
第三章	独特味韵：味论、韵论与西方诗学	(221)
第一节	味论诗学与西方诗学	(221)
一、	梵语诗学味论简述	(222)
二、	情味、情由与情感、客观对应物	(232)
三、	普遍化与非个性化、情感符号、原型论等	(241)
四、	波阇的艳情味与弗洛伊德的原欲	(257)
第二节	韵论话语与西方诗学	(272)
一、	梵语诗学韵论简述	(273)
二、	韵论和象征主义诗学	(282)

三、印度“画诗”论与西方诗画论	(298)
四、诗的梦想与推理	(309)
五、韵论与德里达的解构诗学	(319)
第四章 推陈出新：曲语论、合适论与西方诗学	(331)
第一节 曲语论与西方诗学	(331)
一、曲语论简述	(332)
二、语言和主体性：曲语与奇异词、曲折诗、陌生化	(337)
三、恭多迦音义观和西方言义观	(349)
四、“知音喜悦”论与“隐含读者”说	(360)
第二节 合适论与西方诗学	(370)
一、梵语诗学合适论简述	(371)
二、东西诗学比较视野中的合适论	(377)
第五章 诗人指南：东西“诗人学”理论探幽	(395)
第一节 梵语诗学“诗人学”简述	(396)
第二节 诗、诗人和“诗原人”	(403)
第三节 才能、想象、学问与实践	(414)
第四节 诗的借用与创作模仿	(430)

下 编 延伸性比较研究

第一章 印度之维：梵语诗学研译和印西诗学比较	(440)
第一节 20世纪以来印度梵语诗学研译简况	(440)
第二节 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简况	(457)
第三节 印度比较诗学研究的中国参照	(476)

第二章 东为西用：梵语诗学的现代运用	(498)
第一节 梵语诗学批评的发展概况	(500)
第二节 梵语诗学批评的学理透视	(512)
第三节 跨文化语境的梵语诗学批评	(528)
结 语 从梵语诗学出发超越“中西中心主义”	(543)
参考文献	(550)
后 记	(572)
附录一：Abstract	(581)
附录二：Contents	(584)

绪 论

一、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走到了第三阶段即跨异质文明研究阶段。这是对美国学者所谓“比较文学危机”的自然回应。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倡导者们认为，世界比较文学必须突破西方文明圈内部比较即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比较模式，将比较的视野投向广大的东方地区。印西诗学比较研究便是对这一学术思想的实践。

多少年来，西方文化内部的有识之士也睿智地指出了西方中心或欧洲中心的危害。例如，加拿大学者 A·K·瓦德认为，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印度的贡献不可忽视，但一些西方学者带着一种“文化傲慢”心态，将与希腊或英语文学相异的印度文学视为劣等文学。因此，他建议道：“随着比较文学的日益普

及，尝试将印度文学批评的技术分析和术语引入英语圈是有好处的。印度文学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将之向世界文学研究者、特别是那些印度研究专家传播，印度文学批评原理如那些探讨观众的戏剧体验本质的理论尤其应该如此。”^① 美国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厄尔·迈纳指出，不同的文学植根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因此，尽管困难重重，但比较诗学只能建立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②。迈纳自己便是这一跨文化比较诗学研究的实践者。他在《比较诗学》一书中探讨了西方诗学与日本、中国等东方诗学的不同特点。他对梵语文学和诗学给予了很高评价：“梵语文学为我们研究世界性或中立性的现象提供了最有利的资料。至少中西方的一些核心问题都源于这一文化，它的诗学包罗万象。”^③ 2003年曾访问中国的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即“耶鲁四人帮”之一的J·希利斯·米勒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总是伴随某种强势语言的文化帝国主义而发展，甚至有时是不自觉的。他认为西方学者撰写的多卷本《近代文学史》不如叫做《西方近代批评史》，因为该书并没有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以及阿拉伯、非洲地区的文学。他的观点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传统西方比较文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应当受到广泛的质疑”。怎么纠正这种偏颇和学术弊端呢？

① A. K. Warder, *Indian Kāvya Literature*, Vol. 1, *Literary Criticism*, "Preface",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9.

②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王宇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43页。

③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王宇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26页。

米勒以反问形式代西方学界作答道：“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比较文学难道不应该也把自身全球化吗？难道我们不该教给学生除了欧洲和美国之外的其他文学吗？”因此，米勒建议发展一种“新型的全球性、非欧洲中心化的比较文学”^①。米勒还特别强调，建立这样一种全球化性质的比较文学，最关键的是突破语言的限制，即学习和掌握非欧洲语言如汉语、日语、梵语等。米勒来自西方强势话语圈自我反思意义重大。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向来注重印度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由于学术界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研究模式的影响，欧洲和美国文学研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印度文学研究则被挤压到一个不受人重视的角落里。米勒提到的语言问题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身上同样存在：很多中国学者精通或比较熟悉英语，但同时熟悉梵语或专攻梵语者极其罕见。这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在印度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严重滞后局面。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学界在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研究方面的诸多缺陷。这与中国学术界存在不健康的“中西中心主义”研究模式有关^②。

就目前的中国比较诗学研究而言，跨越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跨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领域，偶有跨中印、中日、中越等的比较诗学研究，也远远不能与中西比较研究的火热程度相提并论。

① 参见希利斯·米勒：《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李元译，《中华读书报》，2003年10月22日。

② 参阅曹顺庆、尹锡南：《突破“中西中心主义”学术研究范式的新尝试》，《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5期。

至于东方其他国家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比较基本上就无从说起了。这客观上形成了比较诗学研究中的“中西中心主义”倾向。只要看看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复兴以来的这些年，中国学者冠以“中西比较诗学”的理论探讨何等丰富，就可明白这一点。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进行中西比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那么，21世纪里，我们还把这一学术路径视为唯一，便会违背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种不如人意的事情还时有发生。例如，“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有一本《比较诗学导论》(2005)，全书七章中的四章以“中西”的字眼担纲：“中西比较诗学的历史与现状”、“中西比较诗学的方法思路”、“中西诗学对话的人思途径”和“中西诗学对话的深度模式”。该书作者有意无意间忽略了世界诗学三大源头之一的梵语诗学和其他东方诗学，使该书启迪学生心智、开拓学生视野的功能打了折扣。而今，梵语诗学重要经典已有中文译本，但“中西中心主义”思想却使大家对其视而不见。

笔者在印度访学期间，曾经见到不少冠以“印西比较”字眼的戏剧学、诗学和美学著作。如M·S·库斯瓦哈的《印度诗学与西方理论》(1988)与《印度和西方的戏剧理论与实践》(2000)等。即使一些著作标示着比较或东西比较的字眼，其内容不外乎是印度与西方的比较，如K·C·潘迪的《比较美学》(1959)、R·L·辛格尔的《亚里斯多德与婆罗多的戏剧理论比较研究》(1977)、A·乔达利亚的《比较美学：东方与西方》(1991)等。换句话说，限于诸多复杂因素，印度学者患上了与中国同行相似的“学术感冒”。如一本题为《全球美学与梵语诗

学》的论著^①，翻检目录，便可发现尽是梵语诗学家新护、欢增等与西方诗学家的比较。在印度学者眼中，“Global”一词意味着“西方的”而非其本义——“全球的”。中国诗学在此失语，阿拉伯诗学在此失语，这是印度版的学术“远视症”，与中国版的“远视症”（即关注西方，忽略东方）如出一辙^②。他们的逻辑是中国加印度等于世界，或印度加西方乃全球也。这的确发人深思。中国与印度学界在各自取得比较诗学研究骄人成绩的同时，都较劲于中西比较或印西比较，从而留下了许多令人遗憾的学术空白。这显示了当今比较诗学研究不太理想的一面。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按照数学原理，三角形最为稳定，而在当今中国比较诗学的“学术三角”中，中西一边比较坚固，中印一边轮廓初现，而印西这条“边线”尚未成型。这足以发人深思。

有学者指出，世界比较文学的中心实际上已经来到中国，但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心地位主要靠“数量”来支撑，它的巩固有待于“质量”的提高，而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是视野不够开阔。清末以前，我们只知中国文论；后来很长一段时期里，只知中国和西方文论，对东方各国文论所知甚少，于是，中国学术界就在中国和西方文论的两点一线上来来回回地进行比较研究。直接后果就是比较诗学研究的第三度空间难以建立，多维

^① Ramaranjan Mukherji, *Global Aesthetics and Indian Poetics*, Delhi: Rashtriya Sanskrit Sansthan, 1998.

^② 参阅尹锡南：《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远视症”》，《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

视野难以形成。引进东方文论后，情况就有了明显改观，因为这一时期的比较诗学便多了一个比较的维度。“像三维世界不同于二维世界一样，‘三点成面’与‘两点一线’也截然不同。因为这个‘三’不仅比‘二’多了一个参照和比较，而且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东方文论，我们真正有资格谈世界文论了。”^①这就是所谓“第三者”原则。让我们举例来说明。关于中国有无悲剧，学者们众说纷纭。朱光潜先生等坚决否认中国存在悲剧，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戏剧几乎等于喜剧的代名词。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艺术存在来自老庄哲学的悲剧精神。它和西方悲剧的区别在于“西方悲剧精神重在表现一种由恐惧而来的崇高感，而中国的悲剧精神则重在看透人生而达到物我两忘的空灵超脱感”^②。然而，这种说法并不能完全平息争议。如果我们在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视野里引入印度和希腊戏剧观，问题会变得更加清楚。亚里斯多德的悲喜剧二分法和印度《舞论》里的戏剧“十色”（十种戏剧类型）划分，把东西方戏剧观念分野表述得淋漓尽致。后世印度学者认为，印度戏剧家不想创作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悲剧，看来的确是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因此，争论中国有无悲剧，与争论中国有无史诗和争论西方诗学有无中印诗学的韵论和味论一样，都属于有些隔靴搔痒的行为。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引

① 郁龙余：《旧红新裁，熠熠生辉：简评〈东方文论选〉》，《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

② 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40页。

人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研究这一重要课题，对于激活中国比较诗学研究乃至促进中国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学界一般认为，世界逻辑学、世界哲学和世界诗学都存在于希腊、中国和印度三大原创性流派，学者们在比较逻辑学、比较哲学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三大诗学体系之间的印西诗学比较仍然未能引起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本书便是改变这一不理想局面的一次尝试。

就梵语诗学的比较价值而言，印度学者认为“迄今为止，几乎可在不同体系的印度诗学里发现所有西方诗学主要原理的种子或萌芽”^①。这为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西方学者也认为，印度四个主要诗学流派中的庄严论和风格论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存在可比性，而味论、韵论则与现象学批评、读者接受理论等有着比较的基础^②。这说明，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研究不仅有着上述理论意义，也有着实践方面的丰富潜力。辨析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的同和异，实际上也折射出东西方文化的同和异。这对中国乃至世界比较文学研究都是一种有意义的学术探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可行性更强。相对于建立在表意文字系统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文论，由于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英语、德语等同样属于印

① R. S. Tiwary, *A Critical Approach to Classical Indian Poetics*, Varanasi: Chowkhamba Orient Alia, 1984, p. 372.

② William S. Haney, *Literary Theory and Sanskrit Poetics: Language, Consciousness, and Meaning*,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3, pp. 42-43.

欧语系，这使得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之间的可比性更强。事实上，同是与宗教哲学联系紧密的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在戏剧理论、语言修辞、审美情感、艺术本质等方面的论述存在很多可比之处。反观部分中国学者进行的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有时给人一种很吃力、很勉强的感觉。例如，近年出版的一本著作《〈文心雕龙〉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在“陌生化”与“奇”、“六观说”和现象学批评之间进行比较，显得非常突兀和牵强。作者以形式和内容这种二元对立的概念为基点，对《文心雕龙》的基本内容进行西式切割，以利于比较研究，给人一种为比较而比较的印象^①。另有学者将《文心雕龙》和《诗学》进行比较，这似乎有些不伦不类。毕竟，《诗学》是专论悲剧、史诗的，而这两种文类在中国文学里的有无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文心雕龙》也没有涉及悲剧和史诗。因此，中国和西方诗学之间的比较研究，的确不如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之间的比较研究那么流畅自如，左右逢源。

美国比较文学理论家雷马克曾经以“围墙”的比喻说明了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三者的区别。在他看来，民族文学在“一墙之内”，比较文学“跨过围墙”，而总体文学站到了“围墙之上”。如果说民族文学是比较文学的起点的话，总体文学则是比较文学的终极目标。总体文学通过研究世界各个民族、各个文明的文学规律，归纳抽象出人类文学共同而普遍的规律。从比较文学走向总体文学，必须在跨文明对话、比较诗

^① 汪洪章：《〈文心雕龙〉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学、双向阐释等学术层面和路径中展开。这一最高学术境界应该是一种三维立体的比较诗学研究，即把世界各个文明圈里的诗学融会贯通地进行比较，以寻找人类文学心灵的一致和差异点。在这一学术背景中，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比较诗学研究如何突破“中西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范式便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在有别于西方和印度的中国文化语境里对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进行比较研究，恰恰是突破“中西中心主义”学术模式，从而顺利走向比较文学总体研究的极好路径。笔者在《英国文学中的印度》一书中，对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形象塑造进行了历史的分析，探索了东西方互动历程中的又一种复杂文化现象^①。这是笔者对所谓“中西中心主义”模式的初次解构。本书则将这一学术探索延伸到文学理论层面，希望藉此丰富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开拓新的研究空间。

二、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

首先说明，之所以选取梵语诗学作为印度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对象，是因为梵语诗学集中体现了印度古代诗学的精华。印度学者达雅古德认为，之所以将梵语诗学当作印度诗学的代表，是因为梵语诗学是自古以来流行于印度各地的文学

^① 尹锡南：《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巴蜀书社，2008年。

理论；梵语诗学是印度对世界诗学的杰出贡献；梵语诗学代表了未受外来理论影响的纯正印度文艺观，而印度现代文学理论则是对梵语诗学或西方诗学的重塑改造^①。另一位著名诗学理论研究者纳根德拉认为，“与西方文学批评相区别的印度文学批评，几乎可以说是梵语文学批评的同义词”^②。这充分说明了梵语诗学在印度诗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即使梵语诗学衰落之后，它对印度各地方语言文学理论的发展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西方诗学交汇融合后的现代印度文学理论，也仍然脱离不了梵语诗学的巨大影响。因此，梵语诗学可以说是印度诗学话语体系的典型代表，正如中国古代文论代表着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本书计划分三大部分进行研究，即宏观性比较研究（分析两大诗学体系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宗教哲学和语言文学基础，以及两大诗学体系发展轨迹的比较）、专题性比较研究（研究梵语诗学各派理论和西方诗学相关理论的异同）、延伸性研究（介绍印度的梵语诗学译介研究史、印西诗学比较史以及梵语诗学现代运用的一般情况）。

本书计划围绕下述基本内容展开研究。

在第一部分里，首先将对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萌芽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进行比较分析。正如前述，梵语诗学与梵语语法

① Suresh Dhayagude, *Western and Indian Poe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Preface", Pun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1981; Also see Sudhakar Pandey & V. N. Jha, ed. *Glimpses of Ancient Indian Poetics*, Delhi: Indian Books Centre, 1993, pp. 182-183.

② Nagendra. *Literary Criticism in India*, "Preface", Nauchandi and Meerut: Sarita Prakashan, 1976.